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发展路向

刘伟杰,戴 祯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第二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来源于对“为何结合”“何以结合”“以何结合”三个问题的深刻回答。从理论维度看,“第二个结合”为党的理论创新开辟出广阔空间;从实践维度看,“第二个结合”有利于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从文化维度看,“第二个结合”能够为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强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第二个结合”的发展路向,可以从巩固定力、激发活力、赓续动力三重视角探析,从而促进“第二个结合”向纵深推进。

关键词: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4)06-0256-07

The internal logic, value im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LIU Weijie, DAI Zhe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ferred to a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omes from the profound answers to the three questions of why, what and how to combine.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pens up a broad space for the CP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safeguar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rom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we can conduct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consolidating the strength,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continuing the driving force, so as to promot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 depth.

Key words: Xi Jinping;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m in China; the "second combination"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即“两个

结合”的重要论断。其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两个结合”写入了全会通过的决议当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第二个结合”),是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这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和境界。“第二个结合”蕴含着深刻的生成逻辑和战略考量,是党在新时代回答好时代之问、人民之间的重要依据和关键法则,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第二个结合”提出以来,该命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论述,相关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第一,理论内涵研究。余卫国^[2]把“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一分为二,指出“第二个结合”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立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历史文化滋养。徐国民等^[3]强调,“第二个结合”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扎根中华文明,才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并爆发出创造历史的强大力量。第二,生成逻辑研究。王峰等^[4]认为,“第二个结合”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相互融通为基础,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主题。靳浩辉^[5]则指出,“第二个结合”既体现了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也回应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诉求。第三,契合之处研究。洪晓楠^[6]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无神论、实践观、辩证法、人性论、历史观与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容比较分析,指出二者虽有差异,但也存在兼容之处。李姝桥^[7]认为,二者在价值理念、实践精神和价值立场上一致,为二者结合创造了可能。第四,发展历程研究。张红飞^[8]梳理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指出“第二个结合”的发展经历了批判总结、调整建设、相互依存、互动共生四个阶段。杨威等^[9]从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对应着中国共产党对理论自觉的呈显、坚守、赓续和升华。第五,价值意蕴研究。王易^[10]指出,“第二个结合”展现了我们党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臧峰宇^[11]认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方案,拓展了传承发展的空间。第六,实践路径研究。冯冉^[12]强调,坚持“第二个结合”,须廓清不可能结合论、文化复古主义论、主次颠倒论、传统文化窄化

论、简单融合论等错误倾向。杨增崇等^[13]认为,推进和发展“第二个结合”,必须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综上所述,随着学界对“第二个结合”命题研究的持续推进,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对“第二个结合”的逻辑、意义、路径等分析存在同质化现象,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为此,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参照和指导,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发展路向作为研究的核心旨要,致力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融通历程,以期能够在巩固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为“第二个结合”深入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提供参考。

一、“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回答好二者“为何结合”“何以结合”“以何结合”的内在逻辑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二者关系的解析入手,结合时代需求,总结百余年实践经验,给出了问题的正确答案,彰显出党对理论自觉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准确洞悉。

(一)为何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18}。中国式现代化是各国现代化之普遍性与中国现代化之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的文化精华,是涵养中国特色的重要源泉,是展现“中国式”的显要元素。因此,推动“第二个结合”,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二者的双向对接和良性互动,共同成就民族复兴伟业。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5]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获得本土关怀,它才能更加凸显其应有的思想引领力。这种本土关怀,不仅体现在与本国国情的联系上,更表现为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193}这一论述深刻道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

之间必然与实然的逻辑贯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底气所在,但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与当代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它依然是传统文化,就不能与现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相兼容、相适应,就不能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法发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作用。唯有通过“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方能“中国式现代化”厚植文化沃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增添深厚底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能。

(二)何以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发源的地域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差异,但从二者的理论特质以及核心内涵来看,二者之间具有诸多共通之处,这为“结合”创造了实现可能。

一方面,二者均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6]44};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自始至终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必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完善,在科学进步中不断充实,方能永葆理论的生机与活力,在人类思想史中散发出永恒的光辉价值。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纵观中华文化历史,无论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汉唐直至明清的八方来朝;无论是魏晋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还是明清直至近代的西学东渐,中华文化始终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的态度,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积极成分,在文化交往交流中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创造出在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二者具有相似的核心内涵。从宇宙观来看,二者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说指出,天、地、人三者“和合”,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能使万物自由生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深刻阐释了“自然报复论”的思想,告诫人们不可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9]。从天下观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天下”的理解蕴含着深刻的辩证色彩,认识到天下的安宁太平离

不开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在政事上要做到“为政以德”,在选拔官员时要谨记“任人唯贤”,对待百姓要注意“民惟邦本”。马克思主义始终要求人们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辩证思维作为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并且站在人民立场上,将人民群众视作“历史的创造者”^[21]。从社会观来看,中华文明向往建立一个“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2],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23],即建立起每个人能够“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23]的共产主义社会。从道德观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以“厚德载物”为目标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对他人应当“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美好图景的同时亦表现出对高尚道德的向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导致的道德异化发出强烈批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契合为“何以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以何结合: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实践的历史已然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契合性,是把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连接起来的思维纽带。李大钊提出“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世界”^[24],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与中华文化中“大同世界”思想串联起来,开启二者结合之先河。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引用了大量成语、典故等中华文化元素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引用《后汉书》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语来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以《水浒传》“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喻巧妙解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同时,毛泽东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阐释“实事求是”等中华文化思想观点,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25]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做法提出深刻批评,彰显出他对发掘本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强烈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提出“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26],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坚定态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引用《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以“小康”一词诠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在他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中,亦能看出《易经》“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影子。江泽民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27]。在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能够明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民本、和谐、生态等智慧的承继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引用中国古典名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其进行新的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昌言》中“安危不貳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一句,向世界传达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多和风险加剧的大背景下,勇于直面困难与挑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他借用《谏逐客书》中“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构建守望相助、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冀和倡导,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立足全球视野思考人类问题的宽广胸襟与宏伟气魄。中国共产党以其百余年的历史实践有力地证明了,站在拥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大地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第二个结合”是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更是将“第二个结合”上升到“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8]以及“又一次的思想解放”^[28]的重要高度。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两个结合”百年来实践历程的总结和承继,亦是对百年来实践经验的升华与创新,开创了推进二者结合的新局面。

二、“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简称“第一个结合”),成为全党的重要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组成,被深刻包含在“第一个结合”的含义之中。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使“第二个结合”从内隐于“第一个结合”,到成为与“第一个结合”并行的重要理论,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拓展和深化,对新时代继续发扬党的创新品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蕴。

(一)为理论辟新:开辟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9]只有主动寻求创新,在思想上主动求变,才能勇立时代潮头,永处不败之地。追求创新

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动力之源。纵观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其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党能够不断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应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的关键之举,是实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之策,让党在新时代更加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里汲取养分,形成更多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理论成果,从而开创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30]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并在其中深刻阐明“第二个结合”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3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饱含着古代先民对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与深邃思考,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党的事业发展进步提供智慧启迪和价值滋养。因此,以“第二个结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能使党在对国家未来发展大势的把握上拥有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时能够牢牢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有利于党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探索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二)为道路筑基: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一脉相承,蕴含着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32]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恰恰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紧密结合。”^[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之源、形成之根、发展之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并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坚实根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与底蕴支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致的、统一的”^[34],二者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亦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相应的文化支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应对“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国情巩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均贫富理想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价值观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奠定了价值基础;“赞天地之化育”的共生意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提供了精神滋养;“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以上足以说明,唯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方能铸就深厚且强大的道路自信,迸发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伟力。

(三)为文化守正:在世界文化激荡背景下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以及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新时代以来,全球格局和国际体系加速演变,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化层面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局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推行文化强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几乎无孔不入,妄图对我国进行文化围堵和文化打压。在此形势之下,牢牢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破局的关键所在。坚持“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提炼、转化、融合”^[35],有利于我们树立对中华文化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世界剧烈的文化激荡中高举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旗帜,这是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组成,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从古至今不同时代在文化领域的显著成就,并且它们之间相互深度关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内容,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广博的智慧来源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传统文化也是民族的“根”和“魂”,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捍卫文化主体性的信心之源,丢掉了传统文化,就等于抛弃了民族的根本,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就会瓦解。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为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对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

传承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守护,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其中就内在地包含了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共同凝铸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精粹的思想意蕴,彰显出党对文化守正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成为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三、“第二个结合”的发展路向

新时代新征程,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始终如一,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具体实践,强化与“第一个结合”的双向互动,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

(一)巩固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要发挥出“第二个结合”的巨大效能,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二者相结合的首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36],必须首先毫不动摇坚持其在二者相结合进程中的指导地位,明晰二者“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否则就会陷入“主次模糊”甚至“主次颠倒”的错误逻辑之中。传统文化因为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难以承担起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既是“第二个结合”的本然之意,也是由其自身特质所赋予的。那些罔顾历史发展规律、主张“以儒代马”的文化复古主义论调,是机械的、错误的,不仅无益于我国社会发展,而且会致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出现偏差。

毛泽东曾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7]“走什么路、举什么旗,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38],马克思主义这面科学旗帜不能改更不能倒。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是用一方取代另一方,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让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实际中去,让马克思主义更贴近中国国情,从而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新表达,更大程度上发挥其指导作用,同时也能够使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照耀下,激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绝不可撼动的,这是新时代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定力所在。

(二) 激发活力：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6]19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的经久不衰、富有永恒价值的精华部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发展,必须继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守正,“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14]16}。即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理念、人文精神、道德品质等进行充分挖掘,进一步明确“第二个结合”的有机生长点,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交融,真正实现二者从相互契合向相互结合的转变与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还应坚定不移创新。首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创新性发展,坚持立足当代,“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31],加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其次,要在创造性转化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当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能够同人们的思想产生共鸣,与群众的利益形成交汇。这既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传播力的关键之举,又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第三,要瞄准世界文化发展前沿,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通过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交流,批判吸收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可资借鉴之处,在博采众长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只有以人类文明集体智慧的合力,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活力,并用其自身永续不竭的“两创”活力,才能在新时代推动中国迸发出创造历史伟业的澎湃力量。

(三) 赓续动力：在具体实践中强化与“第一个结合”的双向互动

新时代发展“第二个结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点。即把握“第一个结合”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条件,绝不可罔顾前者而只机械地谈论后者,否则就会导致陷入厚此薄彼的错误思维之中。“第二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的科学方法,是党着眼于时代新发展和社会实践新要

求,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创新和理论深化。故而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即为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最大参照,“第一个结合”就是“第二个结合”行稳致远的基本依据。因此,唯有立足时代实际,在实践中注重与“第一个结合”进行积极互动,才能进一步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进步。

强化“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的双向互动,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新时代,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迫切需要我们从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31]。必须扎根具体的实践场域,不断探寻“第二个结合”在运用上的新问题,建立起“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让马克思主义真理更富有民族底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备解答当代实际问题的能力,推动“第二个结合”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此外,还应注意“民心是最大的政治”^[39],这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党对理论的顶层设计“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4]15},从人民群众的点滴生活中观察发现,在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里分析领悟,让经由“第二个结合”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更具有亲和力,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不断夯实党的理论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提供永续不断的强劲动力。

四、结 语

“第二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本文从“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分析入手,探究了“第二个结合”中内在包含的“为何结合”“何以结合”“以何结合”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和发展路向展开了创新阐发和拓展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第二个结合”源于党对百年实践历程的经验总结,探讨其在未来的贯彻落实以及优化,应当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紧随社会发展实际,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后提出相应的践行策略。今后,应当密切关注世情、国情、党情的动态变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落实发展情况及时跟进,依据采集到的数据信息对“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唯有如此,方能推动“第二个结合”深入发展,使其不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赋能,为奔涌向前的时代潮流提供指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供给更加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2]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J]. 探索,2022(3):1-14.

[3] 徐国民,王国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2):11-20.

[4] 王峰,王桂芝.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就、逻辑与经验[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0(4):50-56.

[5] 靳浩辉.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四重视阈[J]. 甘肃社会科学,2023(3):52-60.

[6] 洪晓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系统分析[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0):4-15.

[7] 李姝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5):154-159.

[8] 张红飞.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 东岳论丛,2023,44(6):20-27.

[9] 杨威,上官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证成与发展路向[J]. 齐鲁学刊,2022(4):49-59.

[10] 王易.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意蕴[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7):55-62.

[11] 臧峰宇.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J]. 中国社会科学,2023(8):28-33.

[12] 冯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须廓清的几种错误倾向[J]. 思想理论教育,2022(10):41-47.

[13] 杨增崇,范嘉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2):7-17.

[1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8.

[18] 蒲晓娟. 大学·中庸[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95.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20] 戴圣. 礼记[M]. 刘小沙,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48.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8.

[2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40.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91.

[2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3.

[2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24 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4.

[27]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41.

[28]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001).

[2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论丛:第 2 辑[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2.

[30] 林国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弘扬[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2(1):9-17.

[31] 习近平.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 人民日报,2023-07-02(001).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34.

[33] 王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21-28.

[34] 戴木才,彭隆辉.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J]. 哲学动态,2023(7):5-13.

[35] 刘建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2):56-63.

[3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87.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0.

[38] 梁馨熠,梁亚滨. “两个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法宝的三重逻辑[J]. 江西社会科学,2023,43(8):22-31.

[39]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9.

(责任编辑:陈丽琼)